

论当代苏联作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论苏联当代作家
吴元迈 张 捷编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怀柔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15.5 印张 324 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000 册

书号: 10215·54 定价: 1.50元

目 录

艾特玛托夫.....	曹国维(1)
贝科夫.....	冀元璋(27)
邦达列夫.....	陈敬咏(53)
格拉宁.....	刘 宁(83)
加姆扎托夫.....	王守仁(116)
拉斯普京.....	石南征(136)
利帕托夫.....	吕绍宗(161)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张 勇(189)
罗佐夫.....	童道明(211)
梅列日.....	张 捷(237)
普罗斯库林.....	钱善行(268)
舒克申.....	白嗣宏(301)
特里丰诺夫.....	吴元迈(326)
田德里亚科夫.....	李邦媛(359)
瓦西里耶夫.....	潘桂珍(389)
万比洛夫.....	赵鼎真(414)
伊万诺夫.....	刘宗次(432)
伊萨耶夫.....	翟厚隆(465)

艾特玛托夫

曹 国 维

一个本世纪二十年代刚刚创造自己文字的民族，出现了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这样著名的作家，是少见的。艾特玛托夫生长在古老的吉尔吉斯的土地上。他植根生活，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陶冶出浪漫、清新的风格。他那反映当代中亚生活，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作品，在当代苏联文坛上独树一帜。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生于1928年12月12日。他的家乡舍克尔村座落在群山夹峙的塔拉斯谷地。从远古年代起，塔拉斯谷地一直是吉尔吉斯人聚居的地方。

古老的生活方式，古老的风俗习惯，古老的民间文学——当作家来到人世的时候，谷地仿佛还是一个古老的世界。艾特玛托夫的第一位启蒙者是他的聪慧的祖母。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源源不断从她的嘴里流出，好似一

股艺术的清泉，滋润着作家幼小的心田。

艾特玛托夫的父亲早年在江布尔市做工，后来成了吉尔吉斯的第一代苏共党员，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他家周围居住着许多俄罗斯人。在戏耍游玩之中，艾特玛托夫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到了学龄，他进入为俄罗斯孩子开办的学校。这样，他的手里便掌握了一把打开俄罗斯文学宝库的钥匙。

在两种民族文化的哺育下，艾特玛托夫度过了幸福的童年。

1937年，艾特玛托夫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他的父亲——党的干部和红色教授学院学员，惨遭镇压。艾特玛托夫全家迁返故乡。生活开始向作家展示出人生的艰难困苦。

幸好，那个族人聚居、几乎与世隔绝的舍克尔村，以古老的传统方式接纳了蒙受不白之冤的孤儿寡妇，而不是报以白眼、冷淡和歧视。乡亲们资助他们生活上必需的一切，从面包、土豆，直至柴火、衣着。这种深情厚意温暖了患难中的艾特玛托夫的心。

卫国战争爆发以后，艾特玛托夫被迫辍学。尽管只有十四岁，他作为全村最有文化的人，担起了村苏维埃秘书的重任。作家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但是，正如俗话说的：祸者福所倚。

如果，童年的我是从诗意的，光明的一面理解生活的话，那末，现在生活以其严峻、坦露、悲惨、英雄的外表呈现在我的眼前。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在精神和体力极度紧张的时刻，我看到了处于另一状态中的家乡人民。这在我实在是无可奈何，职责所遣的事情——我知道全村土地上的

每一户人家，知道每一户人家的每一个成员，知道每一户人家的寥寥无几的家产。我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了生活迥异的面貌。”^①

此后，艾特玛托夫做过区财政局的税收员，拖拉机队的记工员，与故乡人民一起度过了灾难深重的岁月。

1942年，艾特玛托夫考入江布尔中等畜牧学校。毕业以后，作为优等生，被派送到吉尔吉斯农学院深造。1953年，艾特玛托夫就职于吉尔吉斯畜牧研究所养殖场。然而，他的心向着文学。工作之余，年轻的畜牧技术员埋头写作，试着自己的笔力。

1956年，艾特玛托夫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讲习班进修。两年的学习使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技巧突飞猛进。返回吉尔吉斯以后，他转业从事文学，先后任《吉尔吉斯文学》杂志编辑和《真理报》驻吉尔吉斯特派记者。他的视野更为扩大，生活积累也越见丰富了。

艾特玛托夫的处女作是用俄文写成的短篇《报人久伊多》，发表于1952年。以后又有几个短篇和一部中篇陆续见诸于杂志，但是始终没有被读者所注意。

直到1958年，中篇小说《扎米莉娅》问世，艾特玛托夫方才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此后，他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群山和草原的故事》（《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驼眼泉》、《第一位教师》，1962），中篇小说《大地呵，母亲》（1963），《别了，古利萨雷！》（1966年），《白轮船》（1970年），《早来的仙鹤》（1975年）和《花狗崖》（1977年）。

^①《苏联作家自传》，第4卷，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72年，第14页。

艾特玛托夫注意的中心是人。他的着眼点不在于事件，也不在于人物的命运，而是通过事件和命运，从哲理的高度，写出人的品质和道德，展现人性的美和丑。

道德探索在文学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并且只要人类存在，这个主题也将永远存在下去，所不同的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道德观念要相应发生变化。艾特玛托夫对于这个主题的探索，是从当代生活实际出发的，所以他的作品给人以时代感。

扎米莉娅抛弃富裕安乐的家庭，跟随达尼亚尔私奔的故事，表现出宗法礼教正在吉尔吉斯古老的土地上日益崩溃。作者笔下的达尼亚尔是个从前线退伍归来的战士，外貌不扬，沉郁寡言，还跛着一条腿。在那个以强悍、勇武品评男子的山村里，他不仅不为人们看重，相反，还常常遭到无故的奚落和戏弄。但是，他出人意料地博得了全村最美丽的妇女扎米莉娅的爱情。原因何在呢？作者的回答是，时代在前进。达尼亚尔曾经多年漂泊在外，经历过苏联三十年代工业化的高潮和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接受了新思想，形成了新品格。他自尊自爱，不卑不亢，不苟言笑的外表下面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和美好的灵魂。显然，在宗法传统中土生土长，闭目塞听的凡夫俗子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小说的主人公扎米莉娅并非处在野蛮粗暴、不堪忍受的环境中的小媳妇。从世俗的目光看，她所生活的正是一个标准的美满家庭——公婆慈祥，丈夫勤劳，家境富裕，生活和睦。但是，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女人的幸福就是生儿育女，家庭富足”，使扎米莉娅深感束缚。她不愿意充当单纯的传种接代的工具，不留恋没有温暖和体贴的舒适。终于，她把自己的

心献给了在劳动中得以逐渐了解的达尼亚尔。扎米莉娅勇敢地出走了，跟着一个一无所有，全部财产不过是一件旧大衣和一双破靴子的残废人离乡他去。她在丈夫萨迪克和达尼亚尔之间作了毅然决然的选择，这是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精神枷锁的抗议。

在《驼眼泉》中，同样可以听到时代的步伐。小说反映的，不是司空见惯的勤奋与怠惰的矛盾，而是透过勤奋的表象表现出两种对立的道德。在两个起早摸黑，埋头苦干的拓荒者身上，作者剖析了两个大相径庭的内心世界。克麦尔——善良、好奇、不畏强暴，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中磨炼成长，充满了建设草原的美妙幻想。这是一颗纯洁的灵魂。阿巴基尔——凶恶、残暴、唯利是图，来阿纳尔罕垦荒只是为了赚大钱。他诓走了克麦尔的黄金，骗取了克莉帕的贞洁。这是一颗卑劣的灵魂。于是，一个问题提到了读者的面前：是不是每个工作着的人都是工人呢？回答是，不，首先要看有没有一颗工人的良心。

《第一位教师》写的是穷乡僻壤的第一位教师久伊申，在劳动和战斗中兢兢业业度过了大半生以后，依然担负着极其平凡的工作——邮递信件和书报。岁月似乎从人们记忆中抹去了他已往的功绩，没有象通常那样，给他带来荣誉和尊敬。作者破除了常见的功劳、苦劳与职务、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着力刻划了久伊申艰苦创业，一心为公的革命者的品质。这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形象：为一代人的启蒙费尽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甘于默默无闻的地位而与世无争；为人民的幸福不畏艰险，在与邪恶的斗争中几乎丧命，但是，安于平淡无奇的职守而不图报答。这是何等高

尚的情操呵！

小说中，学校落成典礼上关于久伊申的种种议论值得注意。这段文字影射了苏联六十年代初期虚无主义思潮泛滥时的社会面貌。人们普遍地不理解为革命贡献了全部精力的久伊申，认为他不过是个古怪、执拗、规矩到了迂腐的老头罢了，甚至公开嘲笑他的无能。对于这种状况，作者表示了不满和痛心。

《第一位教师》也是反对当时苏联文艺界非英雄化创作倾向的一个表态。在一篇文章中，艾特玛托夫阐述了小说的写作动机：“近年来，在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创作中显露出若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正面英雄问题态度傲慢，对我们艺术的革命历程，对老一代的传统嗤之以鼻……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自己的小说《第一位教师》……这是我对持有现代派观点的朋友们的自发回答……是的，在《第一位教师》中，我试图肯定我们对文学中正面人物的理解，我有意把一个无限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理想化了……我希望能让现今的青年回忆起他们名垂青史的父辈。”^①

追求物质享受是当代苏联青年中存在的一种普遍倾向。对此作家深感不安。“假如人把物质福利看成是生活的目的，假如他不能防止物质的腐蚀，这必然引起退化。人就会失去自己的本质。”^②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艾特玛托夫写出了《早来的仙鹤》。这是一个发生在卫国战争年代的故事。苏尔坦穆拉特等五个七年级学生接受农庄主席的派遣，停止学业，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完成春播任务。他们团

①《真理报》1963年3月20日。

②《文学问题》1976年第8期，第150页。

结友爱，努力工作，一心要为战胜法西斯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尽管还不知道他们的劳动是否会有收获，但是，这些少年的品质是美好的，永远值得人们的尊敬和仿效。《花狗崖》从另一个侧面，即成年人自身的榜样和责任，谈到了青年的教育问题。三个尼福赫人——族长奥尔甘和两名猎手，带着一个男孩划船出海，向他传授狩猎的本领。不幸，海上浓雾突起，经久不散。猎人迷失了航向。三个尼福赫人为了把船上仅剩的淡水留给孩子，先后跳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作者认为，人类在世代相传中永远存在，人类的道德精神也应当在世代相传中永放光芒。在这方面，成年人和青年人都责无旁贷。

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是理想主义的。无论是蔑视富贵，勇敢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追求幸福的扎米莉娅，还是为人民贡献了一切，称得上革命苦行僧的久伊申，无论是荒无人烟的原野上，用纤细的肩膀扛起了战争重担的苏尔坦穆拉特，还是浓雾笼罩的海洋中，把人的美德、生的希望留给子孙后代的奥尔甘，这些的形象，无不倾注着作者美好的希望。

但是，艾特玛托夫的理想主义与粉饰现实、美化主人公之类的廉价手段没有共同之处。它是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在现实矛盾的尖锐冲突中，在挫折和失败中闪耀出光辉的。

这种立足现实的理想主义，犹如一条红线，贯穿着《别了，古利萨雷！》。

作者笔下的塔纳巴伊是理想的。他是革命的急先锋，在农业集体化浪潮和卫国战争的烽火中，全心全意听从了时代的

召唤。战后，他服从需要，承担了农庄中最苦的活计——放牧。塔纳巴伊又是现实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中，犯过“左”倾的错误。他赞成剥夺被错划为富农的亲哥哥，甚至把人民智慧的创造，吉尔吉斯人民世代居住的毡包，也当作旧时代的残余，一股脑儿加以扫除。他盲从领导，在区里的畜牧会议上，认下了非常“革命”的，然而是无法完成的指标。

塔纳巴伊的牧羊生涯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冬天的草原没有诗情画意，它的主宰是严寒和雨雪。头顶青天的牧羊人在大自然恣意虐待下熬过了无数劳累的白天和黑夜。因为饲料供应不足，他的心血大部付之东流了：饥饿的母羊为了生存，拒不喂奶，透风漏雨的羊圈里，羔羊一批批倒毙。这种悲惨的景状足以使意志薄弱的人泄气，神经脆弱的人发疯。塔纳巴伊痛苦，悲伤，愤怒，但他还是坚持着干，豁上了全家人的性命，那么忠诚，那么刚毅，不愧是一个共产党员。

生活中，除了天灾，还有人祸，而后者对于人的摧残往往又甚于前者。区检察长谢基兹巴耶夫，一个阴险狡诈的官僚，明知羔羊死亡不是工作失职所造成，却以势压人，恶毒咒骂塔纳巴伊“毁灭农庄财富”，是“人民的敌人”。盛怒之下，塔纳巴伊打了这个“穿皮大衣的新老爷”。结果，一心为公的塔纳巴伊成了区委内部卑劣的勾心斗角的牺牲品，丢了党籍。这个残酷的打击，使塔纳巴伊几乎濒于绝望，但是他挺住了，没有丧失生活的意志，对于人民的事业依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不，塔纳巴伊还要活下去，他还要干一番事业哩！”

古利萨雷，一匹伴随了塔纳巴伊半辈子的骏马的形象，

是艾特玛托夫艺术雕塑的一大成功，古利萨雷的性格与塔纳巴伊十分相似，勇猛暴烈，振蹄疾驰时，哪怕有伤身体也无所顾忌。在一年一度的吉尔吉斯村庄和哈萨克村庄举行的抢羊比赛中，古利萨雷战胜所有的对手，赢得了光荣。可惜，不久以后，它被新任的农庄主席、一个暴虐的官僚阿尔达诺夫强行要走，开始了几乎与塔纳巴伊同样悲惨的遭遇。小说中的人物在对待古利萨雷的不同态度中，一一亮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有心地善良、富有人性的，也有残忍成性、冷酷无情的。在折磨多于爱护，苦难甚于欢乐的经历中，古利萨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别了，古利萨雷！”塔纳巴伊洒下一掬深情的泪水，向与自己同命相连的朋友告别。然而，此时此刻的他，不也是在向古利萨雷的苦难告别吗？塔纳巴伊对于未来依然满怀希望。

忠于自己的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做着好事，虽然屡遭不幸，但是毫不动摇，相信未来将是美好的，这就是塔纳巴伊。他与那个一身铜臭和市侩气，埋怨他入党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的儿媳妇相比，实在有着天壤之别。

在艾特玛托夫的理想主义中，人性美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憎恨邪恶，敢于和社会的黑暗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从而改变现实，推动社会前进。把这一思想充分传达给读者，是作家的夙愿。经过长期的探索，他终于在著名的《白轮船》中，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如果说，《别了，古利萨雷！》以善的光辉照出了恶的丑，增强了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那末，《白轮船》以善的毁灭激起人们的义愤，促使他们起来用实际行动反对现实中的一切压迫。它是向黑暗宣战的号角。

作品的主人公小孩没有名字。也许，作者认为，小孩就是最好的名字。它象征着天真、纯洁、憧憬、信仰。深山密林里的生活枯燥单调。然而，小孩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仿佛遨游在优美的童话世界。荒草、怪石，还有书包、望远镜都是他亲密的伙伴。他相信大角鹿母保存了布吉族的传说是真的，他幻想自己能变作人鱼，顺着清澈的山溪，游向蓝蓝的伊塞克湖，游向雄伟美丽的白轮船……他憎恨林区的土皇帝奥罗兹库尔。“咳，别凯姨妈，别凯姨妈！多少次男人打得她半死，可她总是原谅他。爷爷莫蒙也是一味原谅他！为什么要原谅呢？不应当原谅这种人。他是个可恶的坏东西。这儿用不着他。没有他，我们照样过日子。”他在自己想象的天地里，不止一次除掉了这个人间的恶魔。“仇恨的童心在小孩眼前活灵活现地描画出一幅公正惩罚的图画：他们一齐扑向奥罗兹库尔，提手抬脚地把这个肥头胖耳、邋里邋塌的家伙抬到了河边。然后，使劲摇摆了几下，摔进了滚滚的白浪。”

小孩看到美丽的大角鹿，以为鹿母宽恕了人类捕杀大角鹿的罪孽，让它的子孙重新回到了故乡。小孩希望人们从此爱护大角鹿，报答当年鹿母的救命之恩。但是，奥罗兹库尔杀死了母鹿。这一暴戾行动打破了小孩一切美好的幻想。无可奈何之下，小孩用天真烂漫的方式，表示了不与邪恶和平共处的决心。

“你否定了你的童心不能容忍的东西”，作者在故事结尾点明了小孩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小孩死了，邪恶胜利了。但是，这种胜利是虚假的，它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在读者的心里，由于一颗美丽的灵魂的毁灭，对于邪恶的憎恨

达到了顶点。胜利者在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以后，实际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它被愤怒的读者包围了。

《白轮船》的结局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邪恶压倒正义，残暴战胜善良，在生活中是经常发生的。暴露黑暗，以唤起人们共同讨伐，正是为了战胜黑暗。文学需要歌颂光明的作品，只要光明不是凭空臆造；也需要抨击黑暗的作品，只要黑暗不是违背真实。一个是正面教员，一个是反面教员，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如果给小说一个光明的结局，譬如“逮捕奥罗兹库尔，让莫蒙爷爷退休，把小孩送往城里的寄宿学校念书”，那会怎么样呢？岂非皆大欢喜吗？不，“这意味着对恶的大赦”^①。作者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处理。毫无疑问，艾特玛托夫是正确的。光明的结局只会降低读者对于邪恶的憎恨程度，减弱作品的艺术魅力，而作者希望给予读者的坚持斗争，毫不妥协的思想也将化为乌有。

艾特玛托夫笔下的人物，以各自不同的风采和姿态象征着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品质。作家不仅工于开掘形形色色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总是力求通过自己的褒奖、贬责、讽刺、讥笑，给读者以道德上的启示。因为这些人物来自于活生生的现实，所以，作家借助于艺术形象发表的意见也就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社会意义。

托尔戈娜（《大地呵，母亲》）的形象重现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奋斗在大后方的亿万苏联妇女的命运。空前残酷的

①《文学报》1970年7月29日。

战争不仅在前线和沦陷区造成了死亡和苦难，并且在后方的每一座城市和乡村投下了可怖的魔影。噩耗雪片般地飞来。

“象苏凡库尔和卡瑟姆这样的好人死去的时候，大地呵，母亲，为什么高山不倾倒？为什么湖水不泛滥？”托尔戈娜失声痛哭阵亡的丈夫和儿子。她饮泣吞声接受了二儿子马谢利别克的死讯，在等待失踪的三儿子贾伊纳克回归的不安和焦躁中度过了三个春夏和秋冬。最后，战争的余波夺走了与她相依为命的媳妇阿莉曼。“按照风俗，女人是不能去墓地的。但是，我去了，没有人说我什么：我家里没有男人，我无法遵守风俗。我亲手给阿莉曼下葬，亲手把她安放在墓穴的底部，又亲手撒上了第一把泥土。”这如泣如诉的叙述包含着多少悲伤和心酸！命运对于一个人的打击大概不会有比这更大的了。可贵的是，托尔戈娜没有因此失去生活的意志。她把余生献给了孩子，献给了祖国的未来。

在托尔戈娜身上，作者写出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更写出了庄稼汉全部应征的年月里，妇女英勇顽强的劳动。作为生产队长，托尔戈娜除了象别人那样饿着肚子干活以外，还得操心家家户户的生计。面对开垦荒地违反农庄法的威胁，她理直气壮，用“出了事个人负责”的承诺换回了庄员生的权利。为了秋天能有粮食分到庄员手里，她在于心不忍而又不能不做的矛盾中，强行征收了孩子们聊以糊口的麦子的一半，用以播种荒地。强盗抢走耕马和种子，她舍死忘生，匹马追赶的景象更是扣人心弦……为了胜利，为了庄员，托尔戈娜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对于伊利亚斯(《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失足，作者是深为惋惜的。在包办婚姻盛行的年代，阿谢莉违抗父

母之命，以身相许，本来是命运给予伊利亚斯的赏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地生在福中不知福了。伊利亚斯好强，骄傲，自以为是。一次偶然的成功使他忘乎所以，不和其他司机商量，挂着车斗单独出车，以致在崎岖的山路上酿成车祸。阿谢莉出于爱护，要他承认错误，反而遭到白眼，而卡季恰对他一味姑息，倒很合他的心意。是非不分，讳疾忌医，这一世俗常见的现象经过作者巧妙的构思，呈现为一幅戏剧性强，发人深思的图画。伊利亚斯投入卡季恰的怀抱，也就失去了阿谢莉。尽管后来他醒悟回头，但是幸福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在离开的那一天，我来到湖畔，来到那个陡峭的丘岗上。我向天山的群峰，向伊塞克湖告别。别了，伊塞克湖，我的没有唱完的歌！我多么希望能把你，你的湛蓝的波涛和土黄的堤岸一起带走。可是不能呵，就象我不能带走我心上人的爱情一样。别了，阿谢莉！别了，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别了，我心上的人儿！愿你幸福！……”伊利亚斯无限的惆怅和深深的叹息告诫人们要珍惜自己的幸福，不要用自己的手毁了自己生活中的花朵。

莫蒙，一身封建宗法习气的老头，是个善良而又软弱，勤劳而又可怜的人物。“州里的人，远远近近的全都知道莫蒙老头。聪明的人儿还给送了个外号，管他叫‘闲不住’的莫蒙。这个外号，莫蒙倒也受之无愧。对所有的人，哪怕只是见过一面，哪怕只是道听途说，他都一味殷勤相迎，时刻准备为别人做些什么，出力效劳。然而，他的菩萨心肠却谁都不当一回事……谁都不以在他那个年龄应该享有的尊敬对待莫蒙……对他可以任意取笑——老头从不生气，对他可以不予理睬——老头从不计较……也许，他唯一比人家高明的

地方，在于他不怕被人看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蒙就是世上少有的幸福的人了，尽管他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不难感到，作者在怜爱之余，流露了嘲笑和悲哀。实际上，莫蒙老头乐于助人的慷慨中，包藏着一付媚骨。奴颜婢膝的结果，是他屈从了奥罗兹库尔的旨意，昧着良心，枪杀了大角鹿，做了一件在他来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作者在阐述莫蒙这一行为时指出：“当然，假如人们从不在各种因素的压力下，去做违心的事情，向邪恶低头，那是再好不过的。可惜，人类看来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使所有的人摆脱这样的‘弱点’。”^①人们讥笑莫蒙，然而，是否在莫蒙的性格中看到了自身不幸的弱点呢？

奥罗兹库尔的残暴仿佛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是早该绝迹了的，仿佛这个森林巡视员只是抽象的邪恶理念在童话里找到了一个血肉的躯体。其实，细细品读一下《白轮船》，就会发现，奥罗兹库尔确实是个受用人间烟火的地球上的生物。读者第一次见到奥罗兹库尔时，他正从外面作客回来，坐在马背上昏昏欲睡。“凉帽滑到了后胸勺上，露出通红的、发脚很低的前额”，一望便知，是个嗜酒贪杯，脑门狭窄的家伙。“仿照区里领导穿的式样、缝工粗劣的竖领制服从上到下大敞着”，说明这个流里流气，土头土脑的人物很有一点官瘾。不错，享乐和权势是奥罗兹库尔的生活目的，由此产生了他性格中的贪婪和残暴。靠山吃山，不，正确地说，管山吃山。他用国家木材源源不断换取个人实惠。然而，这山望着那山高，看着城里那些人巴结、坐

①《文学报》1970年7月29日。